

18.07

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主編
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長沙市委員會

第十一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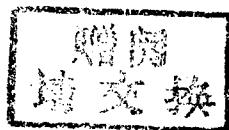
1991 10

長沙文史資料

《纪念辛亥革命八十周年》专辑

长沙文史资料

第十一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长沙市委员会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主编

一九九一年十月

目 录

- 辛亥革命与长沙 文史委员会(1)
辛亥武昌起义亲历记 周武彝(15)
长沙反正前后见闻 陶菊隐(21)
光复长沙的前前后后 龙铁元(29)
长沙籍辛亥革命人物 编写组(32)
周震鳞的家世和生平简述 周世贤(103)
陈家鼎传略 许进(117)
为共和革命而牺牲的余昭常 邓白洲(124)
呕心沥血为共和——黎尚雯传 黎子勋(128)
湖南民主法制的首倡者洪荣圻 胡菊乔(133)
回忆先父唐才质 唐复南(137)
记辛亥革命时期的陆军中将阎鸿飞 朱茂怡(142)
毕永年传略 胡永弘(146)
洪兰生先生轶事 洪度(152)
辛亥革命老人周恢初 周德民(156)
梅坤敏传略 黄祖同(163)
辛亥革命前后的郑望之 朱茂怡(165)
贵州起义的领袖——长沙张百麟 陈庆华 李国微(167)
贵州辛亥革命起义忆略 谭翫(178)
先父谭翫——雪庐先生事略 谭敏 谭昭等(186)
先君李燮和的一生 李兴满 李兴藻(188)
黄兴未刊遗墨 王建宇供稿(200)

杨毓麟绝命书..... 郑 熠供稿(203)

朱德裳未刊日记十五则..... 易祖洛供稿 梁赐龙整理(205)

黄兴创办贫儿院杂忆集录..... 陈崇孝 史 民(212)

后 记

辛亥革命与长沙

长沙市政协文史委员会

1991年10月10日，是辛亥革命80周年纪念日。辛亥革命是我国近代史上一次伟大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它推翻了封建帝制，创建了民主共和，对我国社会历史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素有改革进取精神和革命斗争传统的长沙，是这场革命的重点地区之一。这里，产生了与伟大的革命先驱孙中山并称的卓越领袖黄兴；黄兴和宋教仁、陈天华、谭人凤、蒋翊武、赵声、秦毓鎏、吴禄贞、刘揆一、刘道一、焦达峰等全国著名的革命家曾在这里从事革命活动。本世纪初至1911年长沙所发生的一系列革命事件，在全省乃至全国都起了重大作用，更有大批长沙籍革命志士，追随孙、黄，前赴后继，在长沙或全国其他地区的革命斗争中，作出了贡献。值此隆重纪念辛亥革命80周年之际，本会谨以此文试图对这一伟大革命在长沙的不朽进程和长沙籍革命志士在这一革命中的历史功绩予以简要叙述，以表达我们对80年前为建立新中国而英勇奋斗的志士先烈的无限敬重和永远怀念。

(一)

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运动在长沙的历史进程，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从1903年黄兴等回到长沙从事革命活动，至1905年同盟会湖南分会成立之前，是这一革命在长沙兴起的阶段。

十九世纪末，中国在甲午战争中遭到失败，帝国主义掀起了瓜分中国的狂潮。面临这一危机，中国人民展开了维新变法、救亡图存的斗争。

戊戌变法运动中，长沙地区聚集了梁启超、谭嗣同、黄遵宪等全国著名的维新人士，他们创办时务学堂、设立南学会，发刊《湘报》，使长沙成为全国“最富朝气”的地区。谭嗣同以炽烈的爱国热情投身变法，他大声疾呼“冲决”封建“罗网”，直至以流血变法“请自嗣同始”的气概英勇就义。戊戌政变以后，浏阳唐才常，长沙秦力山和沈荩等在孙中山影响下，发动自立军起义，以大规模武装暴动的形式，继续从事救亡图存的斗争。

戊戌变法和自立军起义造就了一大批改革者和革命者，影响了包括黄兴在内的一代有志青年。它们的失败促成了后来反清革命的兴起，使大批爱国青年由维新转向革命，在谭嗣同、唐才常冲决网罗的呐喊和流血牺牲精神的激励下，从事反清活动，揭开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序幕。

自立军起义失败后，维新志士纷纷东渡，流亡日本；本世纪初清朝实行新政，国内青年知识分子大批赴日留学，革命运动由此勃然兴起。以黄兴为代表的长沙籍青年热情投身其间，组织团体，创办报刊，举行集会，为革命在长沙的兴起和发展作了思想上和组织上的准备。

1903年的拒俄运动被清政府镇压下去以后，留日学生纷纷回国策动革命。同年7月，黄兴回到长沙。应胡元谈之请，任教于明德学堂（今明德中学）。不久，陈天华、谭人凤、宋教仁等也先后来长，他们以明德学堂为基地，进行革命宣传，发展革命力量。11月4日，黄兴借30生辰宴集，邀约刘揆一、宋教仁、章士钊、周震鳞、柳聘农等10余人在长沙西区保甲局巷彭渊恂宅集会，发起成立华兴会。次年2月15日，华兴会在长沙西园龙璋寓所举行有一百多人参加的成立大会，黄兴被推为会长。华兴会以“驱

除鞑虏、复兴中华”为宗旨，以武装起义，“雄据一省与各省纷起”为革命方略。华兴会对外称华兴公司，其总机关设长沙南门外；其下有联络会党的同仇会，运动军队的黄汉会；并在湖北、上海建立了联络机构。华兴会的成员迅速发展到四五百人。

华兴会是中国内地最早成立的革命团体。她对推动湖北、上海革命团体的建立，进而对同盟会的成立了举足轻重的作用。黄兴也以此为世人瞩目，成为辛亥革命的杰出领袖之一。华兴会的成立促进了长沙革命运动的进一步发展，使长沙成为了湖南革命中心，成为了全国革命运动的重要地区之一。

华兴会成立后，决定于1904年11月16日（阴历十月十日），趁西太后七十生辰，省城文武官员在玉皇殿行礼之机，举行起义。这年春初，黄兴和刘揆一雪夜步行，在湘潭一处山洞与哥老会著名首领马福益会晤，商讨起义大计。为筹集经费，黄兴毁家纾难，出卖祖遗田产300石，柳聘农、彭渊恂等也变卖家产，四处借贷。华兴会印发了大量书刊，以宣传革命。其时，长沙城内革命书刊“罗列满布，触手即是，”人们“交头手指，争相阅读。”9月24日，华兴会在浏阳普迹市为马福益举行授将仪式，并赠与枪支、马匹，“仪式庄严，观者如堵，”情绪极为高昂。

10月，起义消息泄露。官府下令侦缉和搜捕党人，黄兴等被迫逃亡。长沙起义虽然流产，但它仍然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时人誉之为：“中国内地革命之先声，”“湖南人之革命思想实籍此……播下种子，植其根基，”革命风潮“则已弥漫三湘七泽矣！”①

长沙起义夭折，长沙革命运动陷入短暂的低潮。黄兴等流亡日本，部分华兴会员留在长沙坚持斗争。湘乡人禹之谟充当了这一时期的实际领导人。1905年5——8月，他曾发动商、学两界，参加了收回粤汉铁路利权和抵制美货的爱国群众运动。他以其鲜明的反帝立场和坚韧、务实的精神赢得了很高的声望，“绅商学各

界之驻湘者，皆推崇之。”并被誉为湖南商会会长和学生自治会会长。

1905年8月，黄兴和孙中山在日本东京成立了中国同盟会。同盟会的成立推动了全国革命的高涨。长沙革命运动从此进入1906年春至1909年的新阶段，即第二阶段。

1905年冬，黄兴从东京密函禹之谟，委托他在长沙组建同盟会湖南分会，并指派陈家鼎前来协助。1906年春，同盟会湖南分会在长沙成立，禹之谟为负责人，机关设在他所创办的湘利黔织布厂（遗址在今荷花池）。在禹之谟、陈家鼎领导下，湖南分会曾在天心阁举行会议，宣传革命，“无论政界、军界、警察、工商界皆得旁听；”又组织《民报》（同盟会总部机关报）发行网，禹之谟“日持革命书报于茶楼酒肆，逢人施给，悍然不讳。”^②他们还派出会员在小吴门等处“开设酒店贱沽，结欢军人。”^③长沙又出现了“民气伸张与革命暗潮四布”的形势。

1906年5月发生的公葬陈（天华）、姚（宏业）运动将长沙革命斗争推向高潮。1906年5月，同盟会杰出的革命宣传家陈天华和同盟会骨干姚宏业先后在东京、上海愤国自尽的消息传来长沙，激起了各界人士特别是青年学生的极大悲愤。禹之谟、宁调元首倡公葬陈、姚于岳麓山，以彰义烈。1906年5月23日，陈、姚灵柩迎抵长沙后，禹、陈、宁等即发动学界、军界，冲破官府的层层阻挠，举行公葬仪式。29日，长达十余里的队伍抬着灵柩，分路从朱张渡和小西门过江，前往岳麓山。一万多名学生身着素服、手执白旗，齐唱哀歌。“观者倾城塞路。”军警也只得鹄立两旁，不敢干预。公葬陈、姚事件是同盟会领导长沙人民对清朝统治的一次政治大示威。毛泽东曾称之为“惊天动地可纪的一桩事，”并评论说：“湖南的民气在这个时候几为中狂发癫，激昂到了极点。”^④

适时，同盟会总都又派遣刘道一、蔡绍南回国，返湘策动革命。黄兴特为指示：“今欲规取省城，宜集合会党于省城附近之萍、

浏、醴各县，与运动成熟之军队联合方可举事。”⑤1906年夏，刘、蔡等来到长沙，随即约集同志38人在水陆洲附近船上举行会议，决定于阴历年底发动萍浏醴起义，“占据省垣重地，”并基本确定了起义的策略方针和步骤。会后，刘道一留驻长沙掌握全局，蔡绍南等则分赴各县组织会党。不久，龚春台在浏阳麻石设立了起义总机关。12月4日，起义在麻石爆发，各路随即发动。龚春台、姜守旦等分率义军攻占了浏阳高家头、金刚头、永和市、萍乡上栗等地。各县群众纷起响应，队伍发展到三万多人。起义坚持了一个多月，因清朝重兵镇压而失败。

萍浏醴起义是同盟会成立后领导的第一次大规模武装起义。她第一次在中国打出了“中华民国”的旗帜，发出了必破千年专制，“必建共和民国”的口号，对全国革命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

萍浏醴起义的失败，使革命力量遭到很大损失。刘道一、魏宗铨等起义领导人被捕就义，万余名义军将士遭杀害。同盟会总部再次派来策应起义的宁调元系狱长沙，禹之谟也于1907年1月牺牲。然而，地下烈火仍在燃烧。1907年4月，刘谦、黎尚雯等受宁调元狱中之托，在长沙妙高峰重建同盟会湘支部。8月，起义后败走日本的焦达峰联络孙武等在东京成立共进会，以图在长江流域再举义帜。不久，他就派出黎先诚、黄小山等回长，恢复革命机关。1909年8月，焦达峰又与周海文、刘肯堂等在长沙太平街同福公栈设立湖南共进会总机关。共进会沿用萍浏醴起义时洪江会的名义，以长沙为中心，分途联络省内各地，使全省会党再次统一起来，焦达峰成为继马福益之后湖南会党的魁首，从而为后来发动会党，准备长沙起义奠定了基础。

第三阶段。1910年春——1911年10月，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在长沙日益高涨、终于爆发了辛亥革命的阶段。在这一阶段，革命党人愈挫愈厉，反清风潮愈演愈烈，下层人民群众奋起反抗，资

产阶级立宪派积怨日深，最后，各种反清、抗清、怨清的力量汇合一起，终于推翻了清朝的反动统治。

首先是1910年4月中旬爆发的长沙“抢米”风潮。这场大风潮以长沙南门外黄贵荪一家四口投水自尽事件为导火索，发展为成千上万的手工业工人、贫民、农民大规模的暴动。一天一夜，就捣毁、焚毁了湖南巡抚衙门等官署和外国领事馆、洋行、教堂共40多处。宁乡、浏阳、长沙、善化四县人民也“相继而起”焚毁教堂、官衙。其规模之大、起事之烈，震动到全国，当时即有人惊呼这是“整个清朝前所未见的紊乱。”^⑥长沙抢米风潮是一次群众自发的反帝反封建斗争，它促进了长沙革命时机的成熟，并直接为辛亥革命长沙光复提供了群众基础，这场斗争实际上是辛亥革命的前奏和序曲。

1911年又爆发了以长沙为中心的湖南保路运动。早在八年前，湖南绅、商、学界即率先于湘、鄂、川三省举起了收回粤汉铁路利权的旗帜。1909年，长沙即掀起了保路风潮。1911年5月，清政府悍然宣布“铁路国有”，再一次激起了人民的反抗。这时又是“湘人率先反对”，14日长沙各界在教育会坪举行万人大会，要求清政府收回成命。长株铁路一万多工人举行罢工，进城示威，并倡议“商须罢市，学须停课，一般人民须抗租税。”^⑦6月，在徐特立等倡导下，长沙各校相继罢课。一时“舆情激昂、万众一致，”形成了一个大规模的群众爱国运动。立宪派领导了这场保路运动，而且在革命大风暴迅即到来，清朝统治行将崩溃之际，一部分立宪党人如左学谦、龙璋等也走上了反清革命的道路，原来的一些保路团体和立宪团体也转而成为掩护或从事革命的机关。保路运动是辛亥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标志着辛亥革命在长沙的时机已经成熟。

在“抢米”、“保路”二大风潮冲荡着湖南省城的同时，革命党人也日益加紧了活动。焦达峰、陈作新主动承担了领导责任。

1910年，宋教仁、谭人凤等在上海成立中部同盟会，先后派遣刘文锦等来长，打入新军。他们和焦、陈在新军中做了大量工作，使标、营、队、排、棚各级都有了革命党的代表，不少士兵都参加了同盟会。1911年初，同盟会总部谋划在广州大举起事，派谭人凤、刘承烈等回湘策动响应。谭人凤抵长后，在晏家塘设立机关，布置方略、焦、陈紧相配合，加快了对新军的发动。3月31日，在陈作新主持下，刘文锦在天心阁召开了新军各标营代表72人的会议，作出了加强宣传、组织，“发挥勇敢精神”，“共同赴义”的决定。天心阁会议是对新军革命力量的大动员，但因被暗探侦查悉事败。焦达峰等只得暂离长沙前往汉口。

不久，黄兴领导的广州起义失败的消息传来，5月4日，焦达峰、孙武等在武昌举行紧急会议，商讨两湖革命的发动。会议作出了中国革命以两湖为主的重大决策，确定了“长沙先发难，武汉立即响应；武汉先发难，长沙也要立即响应”的协定。这就是辛亥革命中著名的两湖在十日内互相响应的“约盟誓守”。两湖相互砥砺而终底于成。

武昌会议后，焦达峰等急返长沙。其时保路风潮正炽，民气旺盛，抓住这一良机，焦达峰立即召集陈作新等20多人，密商大计，分任工作。陈作新负运动新军重任，焦则全力主持调集会党、策动巡防营等工作。他们还先后在寿星街培心堂，落星田定忠客栈、太平街贾太傅祠与孚嘉巷设置了秘密机关。

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13日晚，湖北军政府代表赶到长沙，先后与陈作新和立宪派左学谦、谭延闿等会见。次日，由陈作新出面，在杨家山小学召开各界代表会议，成立了以焦、陈为首的同盟会战时统筹部，并决定10月20日举行起义。后因故一再展期至23日。不料，21日晨事机泄露。巡抚余诚格急令新军调离长沙，并关闭城门，大捕党人。时迫事危，焦、陈当机立断，颁布特别命令16道，决定提前于10月22日举义。

22日清晨，在焦，陈指挥下，长沙协操坪（今东风广场）新军正式起义。按原计划，东、北两路分由小吴门和北门入城，中午会攻巡抚衙门（今青少年宫）处决了巡防营统领黄忠浩。余诚格等清朝官员闻变潜逃，长沙起义一举成功。巡抚衙门前坪旗杆上的龙旗，换上了象征革命的“汉”字大旗，长沙遂告光复。当晚，各界代表在省咨议局（遗址在今民主东街）召开特别会议，一致推举焦达峰、陈作新为正副都督。次日，焦、陈就职，宣告中华民国政府湖南军政府正式成立。

湖南军政府成立后，发表了《讨满清檄文》，宣告湖南脱离清廷独立，并电告全省各道、府、州、县，饬令即时归顺。湖南省会光复，声威所播，各地传檄而定，至10月30日，除湘西外，全省次第光复。清王朝在湖南二百多年的封建专制统治，从此寿终正寝。

军政府又作出了援鄂北伐的决定，编组湘军独立第一协，由王隆中带领首批援鄂。10月28日第一协在大西门乘轮北上；以后又陆续派出三批，总兵力达16个营，共八千多人。援鄂湘军在武汉前线和湖北革命军并肩作战，以热血和生命保卫了湖北革命政权。据不完全统计，在武汉保卫战中阵亡的湘军将士，仅有姓名可考者即292人。^⑧

辛亥革命在长沙的胜利，对湖南全省的迅速光复起了决定性作用，在全国也具有重大意义。长沙起义的成功，使湖南成为在全国第一个继武昌首义后光复的省份，它解除了湖北革命政权的后顾之忧，隔断了清廷与华南、西南数省的联系，促进了全国革命的继续高涨。长沙又是全国第一个出师援鄂、保卫辛亥革命的首善之区，为全国各地的光复赢得了时间。

（二）

湖南素来“民风强悍”，“惟楚有材，”自古不乏慷慨悲歌之

士。而为全省政治、文化中心的长沙，衔群龙之首，得风气之先，更是人才辈出，各领风骚；特别是辛亥革命时期，长沙志士如群星璀璨，耀人眼目，产生了辛亥革命的卓越领导人黄兴，涌现了杨毓麟、毕永年，沈荩、秦力山、章士钊、周震鳞、龚春台、焦达峰、陈作新、张百麟、黄钺、彭寿松等一大批杰出的革命家。他们在清末外侮频仍，国难迭起之时，投身反清革命大业，不仅肩负起长沙乃至湖南全省革命的重责，而且奔走于日本、南洋，活跃在全国各地，为辛亥革命在全国的胜利作出了突出的贡献。

首先，在革命的宣传工作方面，长沙志士以强烈的爱国热情和革命精神，较先地展开了革命的宣传工作，对推动辛亥革命高潮的到来起了重要作用。

1901年5月，秦力山在日本东京创办《国民报》月刊，并担任总编辑。该刊“大倡革命仇满学说，措词激昂，”打破了自兴中会成立以来革命沉闷的局面，是中国留日学界的第一份革命刊物。1902年11月，黄兴、杨毓麟等在东京创刊《游学译编》杂志，大力传播民族民主革命思想，成为当时在留日学生中颇负盛名的革命刊物，章士利是一位卓著声名的宣传家，1902年，在上海充任中国教育会机关报《苏报》主笔。利用这一阵地，宣传民族主义思想，并曾推荐邹容《革命军》一书，发表章太炎驳斥康有为、梁启超保皇言论的文章。次年8月，他又在上海创办了革命报刊《国民日日报》，1903年，他还先后编写了《黄帝魂》、《孙逸仙》、《沈荩》，《苏报案纪事》等书。其中《孙逸仙》系节译自日本友人宫崎滔天《三十三年落花梦》，他在译者自序中赞颂孙中山为“近今谈革命者之始祖，实行革命者之北辰；”认为“谈兴中国者，不可脱离孙逸仙三字。”这本书在国内外广泛流传，对宣传孙中山的革命生涯，确立孙中山的革命领导地位起了较大的作用。也是这一年，杨毓麟撰写了著名的《新湖南》一书。该书以痛快淋漓的笔触，揭露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罪行，批驳康、梁保

皇谬论，旗帜鲜明地提出了反俄必先反清的主张。该书受到广大爱国青年和革命志士的欢迎，在当时的思想界产生了很大影响。

同盟会成立后，长沙志士的宣传工作更为扎实、广泛。黄兴积极为《民报》撰稿。陈家鼎、杨毓麟于1907年分别在东京、上海主编《汉帜》报和《神州日报》，“极力鼓吹革命，直诛政府之专制。”

其次，在革命组织工作方面，长沙志士最先成立了国内内地的革命团体，积极组建同盟会，出色地从事联络会党，运动军队的活动，为革命队伍的建立和壮大，为革命领导核心的形成，作出了显著贡献。

早在本世纪初，长沙志士就开始了革命组织工作。1901年，秦力山在东京发起成立革命团体“国民会”，“其宗旨在宣扬革命仇满二大主义，拟运动海外各埠华侨与内地志士联合一起共图进行。”翌年春初，他又和章太炎等发起“支那亡国二百四十二年纪念会”，号召人们奋起反清，震动了当时的留日学界。1903年拒俄运动兴起，黄兴等在东京组织拒俄义勇队和军国民教育会，以“养成尚武精神，实行民族主义”为宗旨，并提出了鼓吹、起义、暗杀三种革命方法。

1904年，华兴会策划的长沙起义流产以后，黄兴深感“非联合各省革命党员组织一大团体，决不足以推翻清朝，”开始从事革命联合工作。同年冬，他组织数省留日学生，成立了革命同志会。当时人评价说“留东青年，以黄兴为革命实行家，多倾向推重……黄可操东京革命志士之牛耳。”⑨1905年7月，黄兴与孙中山在东京首次会晤，两位领袖情意欢洽，商讨了华兴会、兴中会的联合，从而有了同盟会的成立。长沙志士在建立同盟会过程中起了很大的作用。据统计在1905年7月30日的筹备会上，与会79人，其中湖南20人，而长沙有8人。⑩据同盟会最初两年名册，同盟会共有会员979人，其中湖南158名，长沙为39人。⑪长沙志士是一支较大

的力量。黄兴在同盟会筹建过程中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并成为同盟会内仅次于孙中山的领导人。

同盟会成立后，即派遣人员归国，到各地建立分会，发展革命力量。1905年9月，黄兴亲赴上海，接纳光复会首领蔡元培加入同盟会，建立了上海分会。12月，他到达桂林，在广西巡防营随营学室内发展会员，建立了桂林分会。次年春又委托禹之谟建立湖南分会。1907年10月，张百麟在贵阳成立贵州自治学社。该会革命倾向日趋浓厚并于次年转为同盟会贵州分会。1909至1911年，为适应革命形势的迅速发展，革命党人发挥了高度的革命自觉性，在坚持同盟会反清革命前提下，又建立了一些革命团体。焦达峰等组织的共进会，对两湖革命的发动起了很大作用。彭寿松鉴于福建运动军队工作的不足，在福州创立福建军警同盟会，以军队、警察为对象，很快就发展会员万余人，为稍后的福州光复打下了基础。

再次，是发动武装起义，响应武昌光复。武装起义是资产阶级革命党人从事反清革命的主要形式。他们出入锋镝、血战沙场，以自己的血肉之躯奠定了民主共和的基础。长沙志士在这一方面也作出了很大贡献。

毕永年是长沙籍志士中最早参加革命和最早参加反清武装起义者。1898年戊戌政变发生，他很快就抛弃了改良立宪主张，东渡日本加入了孙中山领导的兴中会，并参加了1900年的兴中会惠州起义。

黄兴是同盟会杰出的军事家。他曾策划华兴会长沙起义和1906年的萍浏醴起义，领导了1907年至1911年同盟会成立以后的八次武装起义。1908年钦州起义，他“以二百人出安南，横行于钦廉上思一带，”激战清兵二万余人，“转战数月，所向无前，敌人闻而生畏，克强之威名因以大著。”^⑫1911年震惊全国的广州“三·廿九”起义中，他亲率“选锋”百余名，直捣总督衙门，

冒死作战，仅以身免。这次起义极大地激励了全国革命士气，“全国久蛰之人心，乃大兴奋。怨愤所积，如怒涛排壑，不可遏抑，不半载而武昌之大革命以成。”^⑬

武昌起义爆发，长沙首先响应，活跃在全国各地的长沙志士也奋起举义。1911年11月4日，张百麟策划贵州起义，宣告独立。11月9日，彭寿松等发动福州起义，福建光复。12月28日，刘先俊等在新疆迪化领导起义，因敌众我寡不幸失败，刘先俊等惨遭杀害。1912年3月11日，黄钺在甘肃秦州发动起义，成立了甘肃临时军政府，黄钺自任都督。

此外，还有一大批长沙志士，如刘树棠、钟厚棠、李家白、杨海滨，吴孙懿、蒋紫馨、黄瑞云、陶忠福、陶懋桢、谭德贵等，深受革命熏陶，投入反清事业，分别在湖北、江西、江苏、广东、浙江等省参加辛亥起义，^⑭有的献出了自己的生命。

综上所述，可以说在本世纪初至武昌起义期间，中国资产阶级革命派所发动的重大活动，几乎都有长沙志士的参加；全国大多数地区，到处可看到他们活跃的身影，宣传革命、组织团体、筹集经费、从事暗杀、发动武装起义……从而在辛亥革命纪念碑上写下了自己的名字。1912年3月，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孙中山曾在一道纪念陈天华、杨毓麟等烈士的命令中说：“按民国缔造之功，匪一手足之烈，睹兹灿烂之国徽，尽系淋漓之血迹。以上诸烈士，或谋未遂而身赴西市，或难未发而瘐死囹圄，或奋铁弹之一击，或举义旗于万夫，或声嘶去国之吟，或身继蹈海之烈。……故铜山崩而洛钟应，光复大业，期月告成。^⑮这同样可用以作为对辛亥革命时期长沙志士昭昭功业的彰扬。”

列宁曾经指出：“如果对伟大的资产阶级革命者不抱至深的敬意，就不能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今天，辛亥革命虽然已经过去整整80年了，但当年长沙志士们为民主共和，为振兴中华而作出的历史贡献，他们的爱国热情和革命精神以及那种坚韧不拔、

百折不挠的斗志，值得我们永远纪念。

与全国一样，辛亥革命在长沙也很快地失败了。1911年10月31日，反动军官梅馨发动长沙政变，焦达峰、陈作新惨遭杀害，革命面临夭折的危险。1913年10月，袁世凯任命其忠实爪牙汤芗铭为湖南都督。从此，长沙开始沦于北洋军阀的黑暗统治之下，又回到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状态。但是，这一伟大革命在长沙造就和影响了一代革命志士和爱国青年，使民主共和、反封建的思想深入人心。她不仅推动了当时社会的发展，而且深深地影响了后来社会历史的发展进程。

注：

①彭楚珩：《光复之经过》，见《中华民国开国五十年文献》（台北）第二编第三册。

②、③金蓉镜：《破邪论》，见《湖南历史资料》1980年第2期第192页。

④《湘江评论》第四期《本会总记》。

⑤刘揆一：《黄兴传记》，见《辛亥革命》（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四、第284页。

⑥见周锡瑞著、杨慎之译《改良与革命——辛亥革命在两湖》，第161页。

⑦《湖南省反对干路国有风潮》，转引自杨世骥《辛亥革命前后湖南史事》第186页。

⑧见贺觉非《辛亥武昌首义人物传》下册第589页。

⑨左舜生：《中国近代史四讲》第283页。

⑩郭汉民：《同盟会非“团体联合”史实考》，见《中国近代史实正误》第396页。

⑪《中国同盟会成立初期(乙巳、丙午两年)之会员名册》，见《辛亥革命史料选辑》上、第116——124页。